

文化强省与 中原崛起战略

李庚香 著

文化强省与 中原崛起战略

李庚香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强省与中原崛起战略/李庚香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8

ISBN 978-7-80765-270-0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化事业 - 研究 - 河南省 IV. ①G127.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6908 号

策 划 许华伟

责任编辑 许华伟 俞芸

责任校对 丁淑芳

美术编辑 刘运来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字 数 459 00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胡锦涛

序 言

文化强省与中原崛起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是省委、省政府在把握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判断我省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李克强同志明确指出：“在河南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受资源、环境等条件约束比较多的地方实现中原崛起，必须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怎样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实现中原崛起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不仅要求经济发展水平上一个大的台阶，而且要求文化事业上有显著的进步，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同时，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也指出：“要深入研究文化建设。文化资源丰富是河南很明显、很独特的优势，也是河南最根本、最重要的优势。中原要崛起、河南要振兴，首先必须突出河南文化的优势、发挥河南文化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讲，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很重要。”“下一步，对什么是文化强省、怎样建设文化强省、文化优势是什么、怎样在经

济发展中发挥文化优势等问题，都要认真研究。”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宏伟目标的提出为河南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为河南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传承中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河南，实现文化强省，既是中原崛起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保障力量，对于我们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部崛起与“文化强省”的提出

中国“和平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造成的“软实力”与西方社会不同。与英、法、美、日、德当年的崛起，用战争和经济竞争这种“硬实力”极大地冲击世界格局不同，中国社会由于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因此它的崛起为他国提供的是一种发展机遇而不会构成对他国的威胁。

这种文化的竞争与战争、经济竞争虽然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其冲突也是十分激烈的。西方社会持“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会发生“文明的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他说得很明白：“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根本的挑战……与同日本的冲突一样，中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权力的根本问题。”^①中西文化第一次冲突表现在近代。读中国通史，最揪心的是百年中国近代史，这是中国“五千年一大变局”。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丧失了抵抗能力，除去其他因素外，它与近代中国“文化链”的中断造成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很难说

^①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没有凝聚力，是“一盘散沙”。问题在于，16~19世纪，特别是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欧洲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场，官僚政治、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与西方社会“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阿基米德），“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达尔文）的文化取向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种心性之学，儒家讲正心率性，道家讲持心适性，佛家讲明心适性。费正清指出：“中国是成功文明的明星般的例子……中国达到了在前工业条件下可能的经济发展水平，然后停滞不前了；没有证据显示有推动它朝不同方向前进的力量。”^①此间出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落日的辉煌”。事实上，西方文化从“夷学”到“西学”到“新学”，真实反映出中国接受者的复杂心态。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农业文化，它与西方社会工业文化的时代落差是巨大的。当西方社会致力于科学实验和大机器生产时，我们的文化却品味着“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当西方社会大规模使用纺纱机时，我们却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阶段表现在当代，表现形态为竞争与合作并存，其实质则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交流、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反对西方社会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坚持文化的独立性品格，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局限性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传统负面性的批判应该是同步的。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负面性的体会是深刻的，批判也是尖锐的。雅斯贝尔斯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欧

^① [美]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处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①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丹尼尔·贝尔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目前工业化社会的轴心结构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官僚体制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社会冲突的格局。而文化领域的特征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它是反体制的，这种“自我”同社会秩序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从而产生文化危机。^②但在文化发展和演进的历程中，由于无视中西文化的差异，没有正确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我们走了不少弯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相适应，如何正确地发挥文化的作用，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至今仍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在中国“和平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原崛起”还是“中部塌陷”就变得十分突出。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西部大开发”不同，“中部崛起”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文化环境和文化条件。如何激活这一巨大的文化存量资源，使之成为“中部崛起”的巨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原崛起”，是“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大省、经济大省和文化大省，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居于“排头兵”、“桥头堡”的举足轻重位置。中原崛起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

① 张文杰等：《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1 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6~27 页。

面,即 2020 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3000 美元,实现小康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基本实现工业化;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河南的发展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实现中原崛起的基本途径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石是“县域经济”发展,支柱是“中原城市群”建设。同时,实现中原崛起,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无论其远景目标还是实现路径,都不能没有先进文化的正确引领,不能没有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不能没有文化强省对河南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建设文化强省,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原文化是一种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的文化类型,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尼迪克特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①5000 年中国文明史,从夏代到清代,在长达近 4000 年的历史时期中,有 3000 年河南一直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 20 多个朝代、200 多位帝王在此建都或迁都于此。从河洛文化(周易文化)到郑卫文化、宋陈学派,再到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最后到宋代理学,中原文化思想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再生力。由于中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古代版,它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国家文化,具有主流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二重性,所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中部崛起”紧密相连,不可或缺。

实现中原崛起,毫无疑问,经济建设是主战场,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先进文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保证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2010 年 3 月,李长春同志明确要求,河南要“充分利用厚重的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强省”。李克强同志十分精辟地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在抓好经济建设这

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 页。

个中心的同时,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的发展,采取措施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支持,通过发展经济推动文化进步,通过繁荣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卢展工同志指出,河南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根源性的特征”,“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荷兰文化战略学家皮尔森说得好:“我们决不预言实际的未来,而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一般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不预言现实的世界,而只是描述所有可能的世界。”^①这也是我们处理文化强省建设与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二、从“大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强省”的内涵和外延

建设文化强省,就是建设“文化河南”。“文化河南”是相对于开放河南、经济河南、法治河南、诚信河南而言的。“文化河南”同“河南文化”相比较,视野更宽,境界更高,时代精神更强。如果说“河南文化”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域文化,那么“文化河南”则有着更深的内涵和更广的外延,是一种“大文化”,而不是“泛文化”。“大文化”不同于“中文化”或“小文化”。根据克莱德·克鲁克洪的观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结构,它并不是信念和行动的所有在物质上可能、在功能上有效的模式杂乱无章的搜集,而是一种有相互依存性的系统,并且具有按某种合适的方式分隔和排布的形式”^②。李克强同志对此作了十分精到的概括,文化强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传承

① [荷]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② [美]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中原文化。二是发展先进文化。他说：“中原文化，这就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一般意义上讲是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流，文化中的精华。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真正要加强研究”，要“围绕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来作贡献”。他明确要求：“中原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广泛内容的课题，我们对中原文化的内涵还要进一步挖掘。”2010年3月5日，刘云山同志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推动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一定要用新的理念认识文化，充分看到文化与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与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联系，把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自觉肩负起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和使命。”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更是明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整体，经济发展只有真正融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要“研究‘大文化’建设的问题，研究文化生产力的问题”，“要搞得比较全面系统，把对‘大文化’发展有什么要求、什么目标、什么任务、什么举措、什么样的工作布局和部署，都体现在里面”。“文化有大文化、小文化之分。大文化包括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些人把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割裂开来，这是不对的”。“目前我省最突出的优势是文化优势”，“历史文化是河南的最大优势，也是河南最根本、最重要的优势”。“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不断强化文化是根、文化是魂的观念，千方百计把中原文化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好，使之既体现在文化建设上，又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真正使文化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文化河南，实现“文化强省”，要求我们必须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河南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从而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能力。

(一) 文化传统的传承。

文化河南是一种“厚重河南”，传承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实现中原文化的现代化。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均发源于此。从《周易》的“河洛文化”到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再到北宋的“理学”，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河南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的自然博物馆”。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河南独有的优势和最为珍贵的无形资产。如何对这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中原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内涵。

戴维·S. 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指出，通过考察几百年来的贫富变迁，他发现国家的贫富除了受制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的提高外，还取决于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在他看来，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不会有资本家精神的产生和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对西方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说：“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中的一员——只是通过这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这样来认识自己。”^①在美国历史上，林肯在谈及比彻·斯托夫人《汤姆叔叔

^①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3页。

的小屋》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时，甚至说“一个妇人发动了一场大战争”。而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化社会中落后，与政治上的专制、封闭、不开放以及古典文化上的优越感紧密相关。因为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使中国成了一个急于学习的国家。在河南加快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提高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和文明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当然，在进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既不是前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后现代文明的解构精神，而只能坚定地以工业文明为旨归，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同时要防止落入“现代化的陷阱”，并努力实现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的融合。

（二）适应新型工业文明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不是独立的文化，文化无所不在。文化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连，融为一体。文化与经济更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有文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经济的最终竞争力还是要靠文化。而现实情况正是这样，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经济文化加快融合的今天，二者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迈克尔·波特指出：“现代经济正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接受生产率范式所要求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新经济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各国是否愿意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率的老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自愿地接受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或是最终被迫转变？问题已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

和变得快慢如何,而不在于是否愿意变。”^①应该说,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公元前800~前200年世界“轴心期”启动了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大发展,中国在这个时期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在16世纪末叶之后,在历史启动的以实现工业文明为目标、以现代化为起点,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个世界“轴心期”的时代,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本尼迪克特指出:“一种文化几乎没有意识到金钱的价值;另一种文化却在行为的一切方面,都视金钱是最基本的价值。”^②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认为:“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在近代以前取得的成就本身。”

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创造一种适合工业文明的经济文化十分重要。中原文化中,从商圣范蠡、弦高到民国时期的康百万,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不计其数。这些中原商人,“富而好行其德”。老子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一种真实的写照。墨子的小农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也很有成效。商圣范蠡认为物价的高低取决于物品的剩余或不足,主张谷贱时政府应该收购,谷贵时政府应该平价出售,应该说较早把握了商品经济的规律。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轻别离,昨日浮梁买茶去”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商人“趋利”的品格。宋代的“市民社会”,应该说已经体现了对经济文化的重视。但是,这种理念还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工业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理念还相距甚远。因此,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建立一种适应工业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经济文化是当务之急。

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企业文化的再造和升级是

① 迈克尔·波特:《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②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是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层面。但是，从总体上说，河南的企业比较缺乏工业文明的理念和文化管理的现代意识。在管理理论中，文化管理是一种高层次的管理。无论是彼得·德鲁克还是杰克·韦尔奇，对于企业文化都十分重视。在中原崛起的过程中，在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今天，我们一定要重视解决企业家文化素质和企业文化、企业道德问题。针对当前民营企业中存在的“封建家长制”经营哲学，企业精神模糊、诚信意识不高的问题，要加大对其企业文化的改造，不断提高其市场生存能力、核心竞争力。

（三）城市文化的创新。

在河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是“三个现代化”的核心。中原城市群建设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影响城市竞争力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等文化力的表现形式是城市产业成长和提高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城市发展最终要以文化论输赢。

在历史上，传说黄帝时代已经开始筑城。《吕氏春秋》记载“夏鲧作城”。《史记》有“禹都阳城”的说法。全国八大古都中，河南有其四（郑州、洛阳、开封、安阳），河南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古都郑州被《诗经·商颂》誉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韩故城的繁华，我们也可以从《诗经》中感受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洛阳东周王城，今天仍然能让人感受到其“王者气象”。北宋东京城，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看，更是繁华。在城市建设上，河南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文化塑造，要根据河南的历史和现实，根据自己的特点构筑多元的城市文化空间。洛阳在城建中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开封城市建设注意和文物景点结合，其龙亭、铁塔点缀其中，都值得推广。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上，我们一方面要注意防

止出现印度、西方社会出现的“城市病”，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城市文化“化人”，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李佩甫的《城的灯》已经对此有所触及。主人公刘汉香如是看待冯家昌：“不管怎么说，他还算是个男人，他没有倒下去，就还是男人。这不怪他，城市太大了，这城市淹人，是城市把他给淹了。”

（四）通过提升村落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河南农业人口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只有两种组织，一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一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任何一个农家庭都处于四重关系之中：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二是用血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三是与市场（集市）相交换的关系，四是家与国相交换（即农民用“赋税”换取国家的“替民做主”的关系）。在古代农村社会，除了乡村的村落文化外，别无城市文化。在这样一种村落文化中，不以曲直而以亲疏论是非。由于小农家庭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得极不充分，至今分散的小农经济如何同大市场相对接的问题仍然是制约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大瓶颈。由于当代农村的基本生存状况是“温饱解决，略有节余”，所以城市消费文化向乡村的迅速传播所激起的新需求，是根本无法从土地上得到满足的。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已经伸入到村落的现代传媒（电视）与向外寻找机会的年轻一代能给村落带来什么新东西。中原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河南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如何通过科技文化教育使河南剩余人口变成人力资本，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则是当务之急。在当前，中原崛起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实现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有使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促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才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促进城

乡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使全省人民共同过上更加富裕的小康生活。在化农民为市民的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无可替代。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中国的现代化不单是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朝阳沟》中拴保、银环等一代人的梦想)或五个现代化(包括政治),更是农民大众的现代化,因而也是古老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文化强省,必须用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统领村落文化,化农业化农村化农民。

(五)创业文化的呼唤。

创业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它体现为人们在追求财富、创造价值、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

创业文化,反映人们合法追求财富的思想观念及其支配下的行为。“它是一种运用个人重要性来创造世界财富的努力,是把内在的自我置于一定的舞台,把各种狭隘的起作用的角色转变为精神实现的努力。”^①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从人类历史上看,经济发展、财富积聚的过程,就是创业文化生成、发展的过程。葡萄牙、西班牙被荷兰、英国取代,英、法被美、日、德超过,用兰德斯的话说:“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文化决定了如何对待就业,如何对待机会,以及从何处得到满足。”^②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的创业文化达到极致。兰德斯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③江浙人、广东人能够积极创业,短时间内就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这与江浙、广东几百年来较发达的工商业历史有关,与江浙、广东地处沿海、信息发达、开放程度高有

^① [美]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② [美]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页。

^③ [美]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